



第一辑 | 卢卡奇专辑 | 本辑主编 周 凡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

REVIEW OF NEW MARXISM

主 编 衣俊卿
执行主编 周 凡

Georg Lukács

超越物化的狂欢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物化的再思考

物化、唯物主义与实践

对我们自己说出真相

意识的物化

走向一种对物化的政治批判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

〈卢卡奇〉 专辑

执行主编 周凡



中央编译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衣俊卿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8

(超越物化的狂欢)

ISBN 978-7-5117-1449-7

I. ①新…

II. ①衣…

III. ①卢卡奇, G. (1885 ~ 1971)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8239 号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

策 划 人 薛晓源

责任编辑 郑 锦 苗永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6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60 千字

印 张 29.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卷首语

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视野

衣俊卿

雅斯贝尔斯曾把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称作世界历史的“轴心期”(Axial Period)。他认为,在这一期间,人类精神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几个彼此独立的地域同时觉醒,人类意识开始从历史深处的潜流中涌出,变成自觉的精神光环,映照原本沉默无言的历史。“轴心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作为先知和立言人的思想家群星般地涌出:孔子、老子、庄子、孟子、佛陀释迦牟尼、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索罗亚斯德,等等。这一轴心期十分重要,因为它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石。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他断言,世界历史可能会出现第二个轴心期,但是,这一时刻迟迟没有到来,即便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快车道的科技时代也还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轴心期。

我们虽不敢断言 20 世纪人类开始了一个新的轴心期,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人类精神新突破的可能性。支撑着人类两千多年的“轴心期”文化精神在 20 世纪既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也清楚地显露出自身的误区和极限,因此,人类精神或许可以通过自我反思而开辟新的地平线。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自觉的文化批判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公元前世纪历史轴心期那种思想家群星灿烂的场景:胡塞尔、弗洛伊德、韦伯、西美尔、舍勒、柏格森、维特根斯坦、罗素、斯宾格勒、汤因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阿伦特、波伏娃、本尼迪克特、

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伽达默尔，等等。在 20 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构成了一道亮丽的理论风景线和一个最耀眼的思想星丛：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列菲伏尔、哥德曼、赖希、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哈贝马斯、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赫勒、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思想家。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秉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价值立场，直面当代人类重大问题和文化困境，展开了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的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思想和文化精神，而且为人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掌控历史变局、摆脱危机灾难、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不全面了解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我们很难深刻把握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内涵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过去 30 多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重要课题。毋庸置疑，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其研究的触角几乎已经伸入所有主要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之中，并且对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树作出了各种梳理和总结。而且，我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 20 年前主要关注已故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拓展到同步跟踪当代国外各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可以断言，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独立设立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正式设置，必将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升温。

毫无疑问，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面展开，从思想资源、问题意识、理论范畴、研究范式等许多方面丰富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 20 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开凿了一个特别的透视路径。然而，对于新马克思主义这一丰富的理论

宝库，我们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这种开疆拓土式的“初耕耘”，必须进一步地精耕细作。目前学术界也在从不同视角思考如何在新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深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现象。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应当清楚的一点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主要停留于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框架和研究范式来解读新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自觉地开启和展开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视野，特别是国际比较视野。这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处于“接受式”的解读，无法行之有效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此，《新马克思主义评论》拟搭建一个开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比较视野的平台，对于人们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流派逐一推出“专辑”，选译和推介国外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学术界更加深入地开展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借鉴。显然，这样一项工作对于深化我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于加深我们关于当代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把握，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积极的国际理论交流，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对于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机遇、挑战和责任正在无限增大的中国来说，这是我们不能不开启的重要的国际比较视野和多维的世界眼光。记得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曾经强调，不应埋头孤立地探究文化的起源和本质，而应当致力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解释和比较研究。他说：“阐释人类学的基本使命不是回答我们最深切的问题，而是让我们了解在其他山谷放牧其他羊群的其他人所给予的回答，从而把这些答案收入可供咨询的有关人类言说的记录当中。”当然，我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会满足于关于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理论观点的记录和阐释，但是，多维度的比较视野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

2012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引 论 纯粹意识中的主体生成

——论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多重思想来源 周 凡 1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安德鲁·阿拉托 30

物化的再思考 汉纳·F. 皮特金 90

物化、唯物主义与实践

——阿多诺对卢卡奇的批判 蒂莫西·霍尔 123

对我们自己说出真相

——卢卡奇、虚假意识以及民主的困境 彼得·A. 迈耶斯 144

意识的物化

——卢卡奇同一的主体—客体中的胡塞尔现象学 理查德·韦斯特曼
..... 199

走向一种对物化的政治批判

——卢卡奇、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目标 阿尼塔·查里 241

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异化和物化概念 乔治·马尔库什 264

逃离物化的控制

- 卢卡奇、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物化概念 哈瑞·F. 达姆斯 291

超越韦伯的现代性范畴？

- 卢卡奇与施米特早期论合理化 约翰·P. 麦考密克 315

科学认识和政治行动

-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思想悖论 吉多·斯塔罗斯塔 359

早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一个评估 加里斯·斯特德曼·琼斯 383

附 录 一位伟大思者孤绝心灵的文化守望 衣俊卿 436

引 论

纯粹意识中的主体生成

——论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多重思想来源

周 凡

国内哲学界对卢卡奇的研究已历时三十余载,《历史与阶级意识》已有了三个汉译本,关于卢卡奇哲学思想方面的论文在数量上已有相当的“积累”,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对卢卡奇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国内哲学学者们对卢卡奇的“青睐”和“热情”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除了卢卡奇哲学本身的独特魅力之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一种中介性的意味,即通过卢卡奇来表达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不绝于耳”的不满、通过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读来“激活”对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的深入的学术探索,这种寄寓性的愿望确乎促进了对卢卡奇思想的介绍并引发对卢卡奇和马克思的“比较研究”。但是,由于学术动机的不纯粹和肤浅的外在的比較的败坏,致使对卢卡奇的理解既不全面同时又欠深度。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把握有三个背景取置: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内的卢卡奇,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内的卢卡奇,三是现代西方哲学之内的卢卡奇。长期以来,我们对卢卡奇的研究只是定位第一个背景和第二个背景之中,并且往往以第二个背景中的卢卡奇作为一个固定的“标签”将之放在第一个背景之中来“挖掘”卢卡奇的错误。这种研究方式本身是成问题的,它先“定性”然后找“毛病”,这几乎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斗”模式,严格说来,算不上是一种纯哲学的研究。我以为,应该从卢卡奇的文本出发,充分审视卢卡奇哲学思想的源流,把他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重新进行理论观照。

应该看到，在传统西方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过程中，卢卡奇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哲学家。他早年十分喜爱诺瓦利斯、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此他早期的作品总以文论的形式来解读人生和世界。同时，他有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素养，又受到了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现象学的浓染重陶。在 20 世纪，他的哲学思想又影响了海德格尔、萨特、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一大批现当代哲学家。事实上，卢卡奇在转向马克思之前曾历经了漫长的精神之旅和心路历程，如果我们把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段隔离开来作孤立的封闭的“片断”式的考察，我们就很难看清楚卢卡奇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就很难弄明白卢卡奇思想转变的实质蕴含，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卢卡奇哲学的一些中心概念的深刻意义。我的观点是，必须把《历史与阶级意识》置于卢卡奇一战前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来考量。

—

我们知道，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运用了两个核心概念——“总体性”和“物化”来建构自己的哲学。“总体性”的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早在《小说理论》中这一概念已发挥了作用。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的丧失是现代的时代特征，而小说作为一种“理念的先验的故乡丧失状态的形式”才以文学的方式来筑造虚幻的总体性。关于物化概念，卢卡奇自称是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分析中得出的。但应该明确的是，卢卡奇在早期著作中，不论是《现代戏剧发展史》还是《心灵与形式》中都已经使用了“异化”（Entfremdung）这一概念，并且《心灵与形式》的主题就是论“异化”。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基本上废弃了“异化”这一措辞而启用“物化”（Verdinglichung）这一术语。而我们长期诟病于卢卡奇的恰恰是指摘卢卡奇用“物化”概念表达了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所表达的思想，而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又等同于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这就是说卢卡奇的错误在于两个“混同”：一是物化和异化的混同；二是物化和对

象化的混同。甚至卢卡奇本人也承认了自己在这方面犯下了“错误”。但我认为，这种指责并没有很硬的道理，其中大有牵强的成分。我们承认卢卡奇早期作品中的“异化”概念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概念确有联系并且有意义上的交叠，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不是完全等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认为卢卡奇将二者完全等同化，我们就无法解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构成了对西美尔和韦伯的批判。

我们知道，卢卡奇早年十分迷恋西美尔的文化哲学，他自己曾坦言，为他的处女作《现代戏剧发展史》提供方法论前提的把握文化史的理论框架本身并不具有原创性，它实质就是西美尔哲学。至1912年始，卢卡奇又和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过从甚密并受到韦伯很深的影响。而《小说理论》对黑格尔思想的接受则表明卢卡奇已在疏离属于新康德主义学派的西美尔和韦伯，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则鲜明地对西美尔和韦伯展开了批判。所以从《现代戏剧发展史》经《小说理论》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卢卡奇在思想上分别接受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影响的演变历程。

在卢卡奇思想的新康德主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核心概念是“异化”。在《心灵与形式》中，卢卡奇说“生活是苦难，生存是悲凉，工作是无聊”，卢卡奇认为异化是人的不可逃避的必然命运。他断言“人注定是要异化的。”而异化的克服只能以艺术为途径，当时卢卡奇认为克服异化的艺术形式是诗和悲剧，在论及诗人对总体性的追求时，卢卡奇这样写道“这条通向内心的道路是向着他们对统一和普遍性的伟大综合的渴望的唯一可能性。他们在寻找一种秩序，但不是一种包容一切的秩序，而是一种不再需要被迫放弃的秩序；他们尝试着用从所有不和谐的音乐合奏中产生一部和谐的交响乐这样一种方式来覆盖整个世界。”^①在转向黑格尔之后，“总体性”成了卢卡奇论述小说理论的理论方法“小说世界的客观结构展现了一个异质的、由调控理念所控制的

①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总体性，这个总体性的意义虽已被指明，但没有被给定。所以，人的个性和世界的统一——这个统一体被记忆朦胧地照亮，也曾经一度是我们所体验到的经验的一部分——主体决定性与本质的客体反映性的统一是承担小说形式所要求的总体性的最深刻、最本真的手段。”^①但这种“总体性”还不是“健康”的总体性，它仅仅是一种企盼和渴望，它是对英雄叙事诗时代所拥有的生命的完整性的深切的眷顾，它是对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的二元对峙和分裂的强势反拨，这种“总体性”终究是虚幻的，它只能在作为艺术形式的“小说”中实现自身。卢卡奇当然不满足于这种栖身于小说之中的“总体性”，他总想在社会现实中寻找对总体性的“真实”地表达。历史为卢卡奇提供了机缘。匈牙利革命的迅速成功又突然夭亡，卢卡奇本人从匈牙利共产党要员、教育副总理转眼间亡命天涯并一度沦为囚徒。成与败、荣与辱、是与非、观念与现实，这一切交织在卢卡奇的心头、萦绕在脑际。但正是在这“观念”迸发出建构世界的奇异力量的革命运动中，卢卡奇获得了、抓住了一种神奇的意识体验，卢卡奇感到“无产阶级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现实的改造性力量，是“总体性”的历史表达和“武器的批判”。所以从消极性的“异化”概念到虚幻的总体性再到现实的具体的总体性构成了青年卢卡奇思想发展的理路和脉络。

从时间上看，卢卡奇的“异化”概念主要是他1912年前的作品的基础性用语；从卢卡奇思想的学派渊源来看，他的“异化”概念是受新康德主义熏染的产物，而这一时段给予卢卡奇以重要影响的同时代哲学家是狄尔泰和西美尔。卢卡奇和韦伯发生接触和思想上的联系始于1912年，卢卡奇早年作品中的异化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从韦伯的思想中汲取什么养料。长期以来，我们总是笼统地说卢卡奇受到属于新康德主义学派的西美尔与韦伯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卢卡奇接受二者影响的时间的先后，特别是没有注意到西美尔和韦伯之间的思想差异，更没有注意到二者对卢卡奇造成的不同思想效应。甚至在《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

^①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也没有把西美尔和韦伯放在同一章中论述,而是将西美尔和狄尔泰一同归入第四章的“生命哲学”,将韦伯归入第六章的“社会学”。所以,我认为,卢卡奇早期作品的“异化”概念源之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西美尔的文化哲学。

卢卡奇的异化论对狄尔泰和西美尔思想的吸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按照狄尔泰的观点,生命本身是混沌无序的、既无定型又没有目的,而“形式”是“生命”的规范,是“生命”的固定化和秩序化,心灵就是借助于“形式”而获得永恒的生命。生命通过形式获得客观化从而获得可理解性。“在经验和理解过程之中,这个精神世界是通过生命的各种客观化过程,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的”。^①所以在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中存在一个“体验—表现—理解”构成的链条。而在卢卡奇看来,生命被形式化的同时也就是被异化了,形式化就是异化。

其二,西美尔对历史的把握建立在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二元分裂及不可逆性之上。西美尔认为,主观文化作为本来意义的“生命”流露受到“货币”系统客观文化的压制,货币经济“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②人创造的文化、文明本应受制于人,但却摆脱了人的控制实现了独立化并反过来逐渐成为压迫作为主体的人的外在的力量。西美尔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悲剧”,并认为这种文化的客观化就是异化。卢卡奇接受了西美尔的这一观点并在文学理论领域中以各种方式突显这一异化状态。

其三,西美尔认为客观文化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塑造突出表现在“算计功能”在对付世界以及调整个人和社会的内在关系所起的普遍有效的

① 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②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同仁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作用之上。“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它们简化成量的价值行为。”^①在现代生活中，经济关系的准确、精密、严格贯彻到了实践的方方面面，人的伦理生活与精神世界也被“计算”的概念占据。

其四，西美尔对劳动分工在“文化悲剧”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深入而敏锐的分析。他认为，劳动分工是造成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分裂的原因。“在生产方面通常被强调的是，产品是以牺牲生产者的发展为代价完成的。从事单面化劳动的结果是身体—心理能力的提高，这对整体的个人而言毫无价值，甚至经常使其成长受到阻碍。”^②依西美尔之见，由于生产者生产的对象缺乏统一性、完整性，那么在心理—实践意义上这一片断化过程必然在生产者个性的塑造上起作用，这就是说劳动分工使主体的整体性遭到肢解。在此基础上，西美尔进一步剖析了分工所造成的异化“由于大规模的专门化过程造成的，工人的存在形式和其产品的存在形式之间的不恰当关系很容易致使产品与工人完全分道扬镳。产品的意义不是从其生产者的心灵中衍生，而是产生于它和别的渊源不同的产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专门化生产的产品片断式特点，它缺乏精神性的特征，而在完全由单个人完成的劳动产品中却很容易看到这种精神性的特征。因此专门化生产的产品的意义既非主体的反映，也不是创造性精神的反映，而只能在远离主体的客观成就中找到。”^③西美尔这段著名的论述，和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阐述极为相近。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的很早时期便通过西美尔摄取到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了。

二

必须看到，狄尔泰和西美尔是从个体的“生命”以及“文化”的角

① 西美尔 《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② 西美尔 《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③ 西美尔 《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度来谈论“异化”现象的，生命哲学对异化的诠释是同掺和了黑格尔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立场完全吻合的。“应该”与“现实”的对峙首先被预设，而对“现实”他们又感到有一种阻碍，把现实置于怀疑之下，同时又力图在具有某种能动的形式的精神中使客观的对立通过返回到的主观中来而加以克服。施太格瓦尔德曾颇有见地说“把生命哲学和新黑格尔原则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德国广泛流行，但是它早先就存在了。卢卡奇的老师西美尔是为这种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的众多著作家之一。”^①正是这种潜藏在新康德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因素使得卢卡奇早期作品的“异化”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有着相通之处并在意义的规定上存在着一些交叉相容。关于西美尔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计算”化特征及劳动分工对生产者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分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不仅称赞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在细节上“十分有趣”、“感觉敏锐”，而且指出对于物化意识形态，西美尔等思想家“决不想否认搞乱这种现象，他们或多或少明白这种现象的毁坏人性的作用”。^②这就是说，西美尔的异化概念是一个消极性的描述概念，旨在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进行一种文化上把捉和工艺性的玩味。西美尔本人对工艺品有特别的嗜好，甚至将这种嗜好带到了他的哲学中。在《货币哲学》中他对买卖妇女以及卖淫现象的微妙心理分析都无不流露出对工艺品进行品鉴的韵味来。

卢卡奇早年作品中的“异化”概念基本上没有超出西美尔所赋予的意义。可以说，西美尔给卢卡奇的思想效应是“正向”的，毕竟，在西美尔的评头论足式的妙语珠言中蕴含着嘲讽和不满，对异化给生产者的心理及人格带来的破坏西美尔作了精湛的“描写”。但从西美尔式的异化观过渡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概念还有一个特殊的中间环节，这就是韦伯的影响。和西美尔从文化史的视域将资本主义定格作

① 《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张伯霖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7页。

“客观文化”的时代不同的是，韦伯主要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把资本主义把握为一种合理化的进程。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说道“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①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方式、现代国家机制、科技、艺术、宗教、法律以及伦理甚至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表现了理性的原则和精神。显然，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和卢卡奇的思想基调存在巨大的反差，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把卢卡奇从对西美尔的依附中“惊醒”过来，一如日本学者初见基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卢卡奇和韦伯“在思想观点方面的紧张关系，自1912年第一次相遇以来，一直到他们各自死亡之前，就始终没有得到缓解”。^②毋庸置疑，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是一个积极性记述概念，它和西美尔的“异化”观的消极性质很不相容，卢卡奇对这种“不相容”在行动上的回应是：他于1918年加入共产党，他把手稿及一千六百多封信件寄存在海德堡的一家银行，告别了韦伯，投身到匈牙利革命中去了。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他借助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中又对这种不相容作出了回应：他对韦伯的“合理化”加以“逆转”从而推出了自己的“物化”概念。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就是物化。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十分经典地论述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和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之间的关系。他说“卢卡奇把合理化和物化理解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并为之准备好了两个论据，这两个论据是以韦伯的分析为基础的，但却是反对韦伯分析的结论的。”^③可以说，韦伯的“合理化”思想给卢卡奇造成了迅猛的“反弹”，这种观念深处的“逆动”使卢卡奇甚至感到西美尔的“异化”概念的消极性还远远不够，必须寻求一种彻底的否定性的概念，以便为彻底否定这一彻底否定性的概念的出现创造条件。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

② 初见基《卢卡奇》，范景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③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上册，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50页。

通过对《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性质分析的解读，卢卡奇得出了自己的“物化”概念。在《物化和无产阶意识》中，卢卡奇对物化概念进行了详尽地规定和阐述。从表面看，卢卡奇对物化的规定似乎并没有超出西美尔和韦伯的思想，因为卢卡奇把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观化，把以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把分工造成的生产的机械性支离、生产者的原子化和孤立化，把生产者由于劳动的不完整性而带来的人格的破碎都纳入了“物化”的特性之中，而这些均是西美尔或韦伯思想中已有之义。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又十分尖锐地把西美尔和韦伯的这些思想称作“物化的意识”，说他们“最终失望地放弃了对以这种形式主义作为基础的物化的透彻了解”，^①并从多个层面展开了对他们的严厉的批判。所以，我们不能仅从卢卡奇对“物化”的表现所作的“描述”上来狭隘地理解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因为物化的直接的表现是连西美尔和韦伯也承认不讳的，关键在于：物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正是在如何把握明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成为现时代的“特征”的物化现象的意蕴上，卢卡奇与西美尔和韦伯产生了原则上的分歧。

卢卡奇从多方面展开了对西美尔和韦伯的批判。首先，卢卡奇批判了西美尔和韦伯思想的“直接性”，说他们“始终停留在分析物化的直接性上面”，“没有因此而超出单纯的描写，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化’，就是围绕着物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兜圈子”。^②正是由于他们的“习惯于对纯直接性的思维和感觉”，他们才将“对象的直接既定的物的形式”当作“首要的、真实的、客观的”存在。其次，卢卡奇批判了西美尔和韦伯思想的“形式性”。卢卡奇认为，直接性思维的表现就是概念的形式性。卢卡奇指出，理性的形式主义的认识方式被当做把握现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独断主义的假设。这种把历史形式化的要害就在于它以形式的合理性掩盖实质的不合理性，把无法纳入形式的东西统统视为“偶然”的、异在的、非理性的东西加以排斥，而把物化了的世界当作唯一可能的、唯一从概念上可以把握的、可以理解的世界。第

①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0页。

②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